

## 同氣連枝：早期同善堂的粵港澳慈善足跡

梁佳俊

**[摘要]** 本文圍繞澳門同善堂成立的社會背景、早期的善書出版等四條線索，從一個側面記述粵港澳三地慈善團體之間、百姓與善堂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探視在珠江三角洲這片土地上流動的人如何塑造同善堂的歷史以及探討該機構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發展特點。

**[關鍵詞]** 粵港澳 善堂 善書 中醫藥

### 一、前言

“廣州城、香港地、澳門街”，“省港澳”三地一衣帶水，同氣連枝。“從 1757 年到 1842 年，廣州是官方認定的中國外貿中心”。<sup>①</sup> 當時所有外商需在澳門申請一位引水人，由其向粵海關報告船隻和貨物情況，在辦理手續、繳納費用並取得執照後，才可進入珠江水道到虎門，再至黃埔錨地。<sup>②</sup> 而在非貿易季節，外商僅可停駐澳門，家眷更是全年只可留澳。<sup>③</sup> 在上述時期廣州是全國貨物流通世界以及各國貨品輸入全國的重要窗口，澳門則作為省城的外港與其相輔相成。<sup>④</sup>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被迫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和開放五口通商，香港開埠後則逐步發展成連接中外的貿易和航運中心。無論是遍佈三地的聯營商號還是教育機構，無論是文化交流還是人員往來，“省港澳”在方方面面都緊密相連，廣州居中，上承澳門，下啟香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不同的作用。<sup>⑤</sup>

作者簡介：梁佳俊，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客席助理教授。

- ① (美) 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著，江滢河、黃超譯：《廣州貿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 (1700—18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13。
- ② (美) 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著，江滢河、黃超譯：《廣州貿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 (1700—18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4、17；程美寶等著：《把世界帶進中國：從澳門出發的中國近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0—21。
- ③ (美) 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著，江滢河、黃超譯：《廣州貿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 (1700—18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8—9；程美寶等著：《把世界帶進中國：從澳門出發的中國近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43；(美) 史蒂芬·普拉特 (Stephen R. Platt) 著，黃中憲譯：《帝國暮色：鴉片戰爭與中國最後盛世的終結》，新北：衛城出版，2018 年，頁 86。
- ④ 程美寶等著：《把世界帶進中國：從澳門出發的中國近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09。
- ⑤ 程美寶：〈從“省港澳”到“粵港澳”——歷史失憶與現實定位〉，程美寶、黃素娟主編：《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頁 8。

就慈善事業的發展而言，同治、光緒年間是嶺南善會善堂的迅速崛起時期。以廣州九善堂，香港東華醫院、保良局，澳門鏡湖醫院、同善堂為代表的傳統華人慈善組織在清末民初這一時局混亂的年代通力合作，為維繫本地區的社會穩定發揮積極作用。

同善堂扎根澳門本地，服務在澳居民為主，然而在文獻中仍可發現同善堂支持珠三角慈善組織以及外地紳商參與同善堂活動的足跡。本文嘗試通過研究同善堂成立的社會背景、1892 年刊印善書、1894 年成立施棺木抬工善會，以及 1920 至 1940 年代與中醫藥相關的同善堂事跡等四條主線，從一個側面記述粵港澳三地百姓與善堂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探視在珠江三角洲這片土地上來往穿梭的人們如何形塑澳門同善堂的歷史並探討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同善堂的發展特點。

## 二、同善堂成立的社會背景

19 世紀 50 年代嶺南地區社會動盪，一方面受太平天國運動（1850 — 1864）及洪兵起義（1854 — 1861）等戰事的影響，另一方面土客之爭進一步加劇，由外地移居兩廣的客家人因土地和水權等原因和本地人時常發生衝突。<sup>①</sup> 在此背景下，一部分人選擇遷居澳門和香港。大量人口湧入致使人們對公共服務和支援的需求大增（表 1），然而當時的澳葡政府延續過往華洋分治的特點，對華人的需要未作太多回應，故此自組華人社團以滿足廣大移民需要即有了很大的迫切性。

表 1 1842 — 1950 年澳門人口演變

年份	居住人口	人口變化
1842	34,500	---
1860	85,471	+50,971
1867	81,525	-3,946
1871	81,403	-122
1878	68,086	-13,317
1896	78,627	+10,541
1910	74,866	-3,761
1920	83,984	+9,118
1927	157,175	+73,191
1939	245,194	+88,019
1940	374,737	+129,543
1950	188,896	-185,841

資料來源：節錄自（葡）古萬年（Custódio N. P. S. Cónim）、戴敏麗（Maria Fernanda Bragança Teixeira）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零零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 年，頁 101。

<sup>①</sup>（美）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著，黃中憲譯：《太平天國之秋》，新北：衛城出版，2013 年，頁 51。

在嘉慶（1796—1820）和道光（1821—1850）年間，各地善堂服務已開始傾向於滿足地方的需要。<sup>①</sup>在同治（1861—1874）和光緒（1875—1908）年間，慈善組織在條約港和廣東地區迅速發展，<sup>②</sup>部分華商在原有傳統善會的基礎上學習西方慈善團體的模式，建立起綜合型的中式醫院和善堂。<sup>③</sup>特別是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後，重建地方社會秩序和社會管理模式成為地方管治的重要事宜，各地新建的華人綜合慈善社團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活動，獲得了官方和民眾的雙重認可，隨即成長為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sup>④</sup>

在廣州，參照 1867 年成立的上海普育堂的形式，在官方提供土地和資金的支持下，愛育善堂於 1871 年成立，<sup>⑤</sup>自此開啟了廣州近代善堂事業的帷幕。其後，兩粵廣仁善堂、潤身善社、廣濟醫院、崇正善堂、述善善堂、明善善堂、方便醫院及惠行善堂（一說惠行善院）先後建立或改建為華人慈善組織，人稱“九善堂”。<sup>⑥</sup>

在香港，在時任港督麥當奴（Richard MacDonnell）的支持下，自 1869 年開始東華醫院的籌建工作，當時醫院獲港英政府免費撥予土地和 11 萬多元的款項，1870 年通過《倡建東華醫院總例》，1872 年落成啟用。<sup>⑦</sup>及後，保良局和九龍樂善堂亦於 1878 年及 1880 年分別成立。<sup>⑧</sup>

在澳門，鏡湖醫院的籌備工作始於 1870 年。根據〈倡建鏡湖醫院碑記（西洋公物會所發本醫院地紙照稿刻列）〉的記述：“1870 年 6 月 21 日公物會大憲當堂准許建設華人醫院在三巴門外之地，該地每年收租銀壹大員，此係做醫院租價，日後如將該地做別樣則須另議加多租銀。”<sup>⑨</sup>可見，鏡湖醫院的建立也得到當局以象徵性收費撥地以作支持。到了 1871 年 10 月 28 日沈旺、曹有、德豐及王六等四人作為代表，按照地界章

①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年，頁 186。

② （日）夫馬進著，伍躍、楊文信、張學鋒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700。

③ Kerr, John. “A Chinese Benevolent Associatio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 3, no. 4, 1889, p. 152.

④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年，頁 2；梁其姿：《變中謀穩：明清至近代的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207。

⑤ Rhoads, Edward J. M.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 1895–1911.”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edited by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04; Leung, Angela Ki-che. “Charity, Medicine, and Religion: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Canton* (ca. 1870–1937).”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2015)*, vol. 2, edited by Jan Kiely, Vincent Goossaert and John Lagerwey, Brill, 2015, p. 581.

⑥ 梁其姿：《變中謀穩：明清至近代的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211、221—236；丁新豹：〈從東華醫院與廣州善堂的合作 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粵港融合〉，2012 年 9 月，<https://www.tungwah.org.hk/newsletter/%E5%BE%9E%E6%9D%B1%E8%8F%AF%E9%86%AB%E9%99%A2%E8%88%87%E5%BB%A3%E5%B7%9E%E5%96%84%E5%A0%82%E7%9A%84%E5%90%88%E4%BD%9C%E3%80%80%E3%80%80%E7%9C%8B%E5%8D%81%E4%B9%9D%E4%B8%96%E7%B4%80%E6%9C%AB%E8%87%B3>，2022 年 11 月 10 日讀取；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 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29。

⑦ Kerr, John.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in Canton.” *The China Review*, vol. 3, no. 2, 1874, p. 112; Lethbridge, Henry.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7; 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 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5。

⑧ 趙雨樂：《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 年，頁 50—51。

⑨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 年，頁 6。

程所定之範圍，向澳葡公物會申請辦理澳門鏡湖醫院的院址立契手續，<sup>①</sup> 澳門第一所跨越血緣、地緣和業緣的華人綜合慈善組織自此建立。

上述“省港澳”慈善社團雖以“醫院”或“善堂”之名成立，但其提供的服務項目已超出醫療或救濟的範圍，他們按各自的關注重點和資源，開展贈醫施藥、宣講送書、保護婦孺等多種服務。既學習來華西方慈善組織和醫院的活動形式，亦與其相互競爭。由紳商建立起來的新型華人善堂則在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建立起機構的威信、影響力和地位。

澳門同善堂正式創建於 1892 年末。根據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九日（1892 年 9 月 9 日）發出之〈澳門華政衙門批准“同善別墅”辦理善舉的人情紙〉所示：“（同善別墅）緣香港澳門善事會，托本墅辦理贈醫施藥，以及宣講善書，俱係方便於人，不受人家銀兩之事。茲賃得板樟堂街第廿七號屋乙間，以為辦理此等善舉。”<sup>②</sup> 又據《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轉載之“條議”第一條所載：“本堂原合港澳善士，捐資製送時症丸散敬執字紙而已。今歲仲夏，購得善堂一所，添設贈醫、宣講、送書三事，故多招善友，同勸善舉，和衷共濟，謹始慎終，以垂永遠。”<sup>③</sup> 此處所指的“今歲”即 1892 年，“購得善堂一所”的地址為議事亭 14 號。其後，張敬堂、王麟生、王藹人及蔡鶴朋（鵬）等同善堂的倡建人開始了改建新會址的籌備工作，最初的設計不被議事會（Leal Senado）所接受，在修訂改建計劃後才於 1892 年 11 月 19 日獲得議事會通過施工准照。<sup>④</sup> 1892 年 12 月 1 日張敬堂、王麟生、何連旺、盧九、蔡鶴朋（鵬）、王藹人等 46 位董事在同善堂大堂簽署稟文，正式向澳葡政府提交成立行善公會“同善堂”的申請。<sup>⑤</sup> 相關文件於 1892 年 12 月 2 日交至當局，並於 1893 年 2 月 21 日獲澳督佈渣（Custódio Miguel de Borja）批准章程，2 月 25 日在《澳門地捫憲報》刊出獲准成立的第 31 號札諭及相關章程全文。<sup>⑥</sup>

然而在澳門同善堂正式確立章程及在澳葡當局登記註冊之前，早在 1890 年已有“澳門同善堂”出現在兩粵廣仁善堂“各埠總理值理芳名列”的紀錄。<sup>⑦</sup> 成立於 1890 年的

①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 年，頁 6。

② 〈澳門華政衙門批准“同善別墅”辦理善舉的人情紙〉，王熹、李璟琳、溫學權主編：《同善堂歷史檔案文物選錄》，澳門：同善堂，2020 年，頁 15。

③ 《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澳門：同善堂，1941 年，頁 4。

④ 〈“同善別墅”值事開辦同善堂的申請紙（葡文）及建築立面圖則〉，王熹、李璟琳、溫學權主編：《同善堂歷史檔案文物選錄》，澳門：同善堂，2020 年，頁 16。查該份文件為同善堂再次向議事會提交之建築准照申請，內容並未提及開辦事宜。申請同善堂的稟文於 1892 年 12 月 1 日才簽署提交，詳細可查閱澳門歷史檔案館藏，AH/AC/P-1275 號檔案。

⑤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編號：AH/AC/P-1275。

⑥ 《澳門地捫憲報》，1893 年 2 月 25 日，第 8 號，頁 81—85；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編號：AH/AC/P-1275；梁佳俊：〈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澳門研究》（澳門），第 4 期（2012），頁 41。

⑦ 鄧雨生：《全粵社會實錄初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清代稿鈔本（第五〇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233。

兩粵廣仁善堂位處廣州城靖海門外迎祥街，建堂之初即“以宣講聖諭，舉辦一切救災，各大善舉為宗旨”，<sup>①</sup>與其時嶺南各善堂之服務項目類同。兩粵廣仁善堂有31位澳門總理，其中盧九、王藹人（王積善堂）、何連旺（穗田）、蔡鶴朋（蔡善元堂）、鄭麟初（源來欄）、黃居之（香山輪船）、林志仁等為1892年12月1日向澳督申請成立同善堂的倡建董事。而31人名單中的鄭莘農（鄭寶蔭堂）、黃焯垣（協昌號）、潘禮臣（泰和銀號）、柯翼堂（恒和公司）、李鏡泉（李仁晉堂）、戴子豪（戴崇善堂）、潘雲山（和生號）、蕭瀛洲（時豐銀號）等人亦在不同年份出任同善堂的公推總理，<sup>②</sup>可見華商對廣州澳門兩地慈善組織的鼎力支持。

### 三、1892年刊印《聖學階梯》

自明清以來，“人們認為劇變中的社會發生秩序混亂的主要原因是道德退化”，<sup>③</sup>從地方到中央均以“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作為重要形式，以求達到維繫社會穩定的作用。<sup>④</sup>分送善書則是清末盛行的一項活動，在啟迪民眾導人向善之餘，亦傳播儒學思想，地方儒生和士紳對此尤為支持。<sup>⑤</sup>

送書是同善堂建立後即添設之對外服務，在成立當天即印發了善書——《聖學階梯》。該書刊印於“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孟秋穀旦”，由鮑門梁氏履端敬刊，由時任香山知縣楊文駿題簽。<sup>⑥</sup>該書卷首語寫到：“聖學階梯一書係鮑君啟明鈔撮名言集成，緗帙初，王君藹人取而閱之，甚見理法詳明，津津有味足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公議欲集貲刊刻，懷疑未定。其時（光緒十八年六月望日）張君敬堂謹於武帝案前卜之，喜得甲甲之簽，吉祥止止。可見，神靈默示，義所必為。今得林君侶梅、蕭君焱翹再加詳訂，陳君翰墀喜認繕寫，梁氏履端喜認版金，梁君郁明首認敬送四百套，公諸同人斯舉也。神命之，人悅之，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事之矣。特此順敘其原委焉。”<sup>⑦</sup>

在上述卷首語中所提到的8位人士中，鮑啟明（管理數目）、王藹人（王積善堂）、

<sup>①</sup> 鄧雨生：《全粵社會實錄初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清代稿鈔本（第五〇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29。

<sup>②</sup> 鄧雨生：《全粵社會實錄初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清代稿鈔本（第五〇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29—233；梁佳俊：〈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澳門研究》（澳門），第4期（2012），頁44—45；上述內容經比對《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而得出，而總理所代表之機構僅列出在徵信錄曾記載的資料。

<sup>③</sup> 梁其姿：《變中謀穩：明清至近代的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27。

<sup>④</sup> 梁其姿：《變中謀穩：明清至近代的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序頁1。

<sup>⑤</sup> （日）酒井忠夫著、孫雪梅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下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530。

<sup>⑥</sup> 楊文駿，曾任肇慶府德慶州知州、羅定直隸州知州、香山縣知縣、雷瓊等處地方兵備道、署任廣東按察使，庚子年在京隨同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辦理和約事宜。見盛宣懷：〈請獎李經方楊文駿片〉，《愚齋存稿》卷十三奏疏十三，民國刻本；中國歷史官員量化數據庫，<http://vis.cse.ust.hk/searchjsl>，2022年11月17日讀取；<https://www.macaudata.mo/macabook/book254/html/046901.htm>，2022年11月17日讀取。

<sup>⑦</sup> 《聖學階梯》，澳門：同善堂，1892年。

張敬堂（大利公司）、蕭焱翹（蕭餘慶堂）及梁郁明（管夾萬匙、香港咩也洋行）等 5 人是光緒壬辰癸巳年（1892 — 1893）全澳公推的 12 位同善堂總理。<sup>①</sup> 當中多數為澳門本地人，張敬堂、<sup>②</sup> 梁郁明則有香港背景，參與編印《聖學階梯》的人員與同善堂建堂“合港澳善士”的特點相契合，體現了港澳兩地商人對慈善事業和文教的熱衷。

《聖學階梯》分為上下兩冊，上冊選錄《程端禮先生讀書分年日程》及《小學》，下冊則包括《五子近思錄》《明史·儒林傳》（陳白沙部分）《陳白沙先生乞終養疏》《陳白沙先生集》，附錄中附上《悟道錄》勸善故事十五則，學派特色並不明顯。林侶梅、蕭焱翹對《程端禮先生讀書分年日程》進行了編輯，以便讀者更明白其所推崇的重要理念和規範。<sup>③</sup>

分送善書、宣講聖諭等活動，一方面有利於傳統文化在澳門延續，達到傳播知識的作用，另一方面可加強道德教化，化民成俗，促進本地社會穩定和凝聚力。<sup>④</sup> 與此同時，善堂本身亦在過程中樹立其道德權威的地位。再加上地方官員的題簽認可，使同善堂與“具有威權的朝廷的象徵”建立了聯繫。<sup>⑤</sup>

#### 四、1894 年至 1895 年成立施棺木抬工善會

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不少嶺南地區的勞動階層被迫、被騙踏上出洋務工之路。由於澳葡政府的管治無效以及中葡之間溝通不順，一些唯利是圖的人利用機會令澳門在 1851 年至 1873 年間成為了中國苦力貿易的樞紐。<sup>⑥</sup> 在香港禁止相關活動後，1866 年至 1873 年間，澳門實際上是本地區唯一可進行苦力販賣的地方。<sup>⑦</sup> 1873 年 3 月 27 日里斯本當局命令取締經澳門的苦力販運。<sup>⑧</sup> 澳督歐美德（Visconde de Sam Januário）在 1874 年 3 月 18 日正式停止“中國移民管理所（Superintendência da Emigração Chinesa）”的運作，苦力販運終被禁止。<sup>⑨</sup> 然而，近 20 萬華工在 19 世紀中葉從澳門飄洋過海前往

① 上述資料經比對《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而得出。

② 在〈樂助施棺木抬工善會芳名碑〉中明確列出張敬堂來自香港。見：林發欽、王熹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區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 年，頁 22。

③ 《聖學階梯》具體內容介紹，可參見梁佳俊：〈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澳門研究》（澳門），第 4 期（2012），頁 48 — 50。

④ 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23.

⑤ 蕭鳳霞：〈廿載華南研究之載〉，華南研究會編：《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 年，頁 31 — 40。

⑥ Pinheiro, Francisco Vizeu. “Macao’s Coolie Trade: One City, Two Cultures, Three Communities, Social Harmony, Separate Development and Taxing Vices.” *Review of Culture*, vol. 35, 2010, pp. 61–63.

⑦（葡）古萬年（Custódio N. P. S. Cónim）、戴敏麗（Maria Fernanda Bragança Teixeira）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零零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 年，頁 213。

⑧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 — 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834。

⑨ 《澳門省及帝汶公報》，1874 年 3 月 21 日，第 12 號，頁 45。

美洲，不少都無緣回鄉。<sup>①</sup>

“不穩定、流動性”是跨境遷移的一大特點。<sup>②</sup> 在《華人在他鄉》一書中，孔飛力曾提到外出華工對家鄉有着深切的道德義務和同鄉情懷，<sup>③</sup> 即使遠在千萬之外，也盡量和故鄉緊密相連，通過兩地的組織聯絡感情，交換信息，互相幫助，故土才是生活的中心。“這些移民（猶如）從未離開過家鄉，他們極力地保存着在經濟、文化、親屬關係等方面的歸屬感，對故鄉有着堅定的（認同），而非對自己的現居地”。<sup>④</sup> 故此不少海外華人長期捐資支持家鄉的公共事業、興學助貧，彼此照應同鄉同業。

據《樂助施棺木抬工善會芳名碑》（1894年）所述，<sup>⑤</sup> 同善堂施棺木抬工善會成立於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孟冬穀旦，即1894年末至1895年初。其倡捐值事（包括個人及商號）共90個，其中以個人名義倡捐者87個，以商號名義倡捐者3個。眾值事對棺木抬工的標準進行了明確的規範，“擬備六楞棺木，一律施行。更令四位抬工兩邊扛護遺骸，密掩庶無脆薄之虞，步武安詳藉免顛擄之弊”。<sup>⑥</sup> 就施棺木抬工善會倡捐值事們的背景來看，在90位倡建值事中，22位來自香港、20位來自舊山、20位來自澳門、12位來自橫濱、7位來自檀埠、3位來自小呂宋、平嵐及神符各2位、上海及漢口各1位。可見海外華人對此事十分重視，眾人均“伏望麥舟慨助，遠追范氏芳踪。金囊多捐，仰效鮑公義舉”。<sup>⑦</sup> 而欽加知府銜特授前山海防軍民府李榮富則在該會成立時為其題詞“義推仁孝”，<sup>⑧</sup> 可見官方對此事也表贊同。

就其他樂捐的善長居住地來說，廣東省內及澳門周邊地區包括：寧邑、恭都平嵐、谷都馬石、隆都下坑、四都西江里、恭都唐家、香邑□都北台、<sup>⑨</sup> 香邑恭都北山、會邑獨舟村、香邑黃梁岡、南邑、省城、香邑黃梁都岡山村、香邑都花圍山基、順邑、香邑、新會、東邑、水東、嘉應州長縣、直隸嘉應州、弦溪、谷都東岸、谷都圍山基、井溪、谷都烏石、恭都宮堂、恭都唐軍、良都月角、谷都鴉岡、石岐、開邑、安邑、江門、崖

① (葡) 古萬年(Custódio N. P. S. Cónim)、戴敏麗(Maria Fernanda Bragança Teixeira) 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零零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頁213。

② (日) 濱下武志著，王珍珍譯：《資本的旅行：華僑、僑匯與中華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313。

③ Kuhn, Philip A.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NUS Press, 2008, pp. 43-44.

④ Kuhn, Philip A.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NUS Press, 2008, p. 49.

⑤ 上述石碑部分碑文模糊不清，此處僅按原文照錄。此外，碑文中常以不同的名稱稱呼同一地名，如：省城、省垣，會邑、新會，東邑、東莞，晉邑、晉江，日本、日國，飛士那埠、非士那埠等，如可明確為同一地方時，此處僅列出一。〈樂助施棺木抬工善會芳名碑〉，林發欽、王熹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區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年，頁22-27。

⑥ 〈樂助施棺木抬工善會芳名碑〉，林發欽、王熹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區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年，頁23。

⑦ 〈樂助施棺木抬工善會芳名碑〉，林發欽、王熹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區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年，頁23。

⑧ 〈一八九五年清欽加知府銜特授前山海防軍民府李榮富題：義推仁孝〉，林發欽、王熹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區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年，頁62。

⑨ 原碑文已磨損，模糊不清。若是北台應屬香山仁良都。

州、良都上□、□□古□、良都沙田、谷都橋頭、恭都界大、佛山、鶴山、恩邑、開平、□恭都、番邑、雷城等，外省地區則有：漳州、晉江、漢口、上海、容縣、福建、泉州、江西等，海外地區計有：檀埠、金山、日國、土得頓埠、安南、故之□埠、飛士那埠、埃安埠、杜架非厘埠、暗巴渡埠、孖臣克力埠、思利仕埠、□爹咕埠、希活埠、卡臣囉厘埠、花利埠、之古埠、汪古魯埠、舊倫埠、列倫埠、杜如非□埠、萬利仙拿埠等。雖然因不同譯音等問題而較難考據上述海外各埠的確切地點，不少海外捐款僅為壹大圓，但可體會到海外華人支持貧困鄉親落葉歸根的心願。順帶一提，在捐贈人中還有日本人岡野利兵衛，匯豐銀行亦有捐銀壹佰大圓。

“民德歸厚，首重慎終”，<sup>①</sup> 落葉歸根始終是當時海外華人最重視的事宜，而推廣正統的喪葬禮制，協助海外華人遣回原籍安葬也一直是華南地區慈善組織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

## 五、1920 — 1940 年代與中醫藥相關的同善堂三事跡

明清時期的衛生事務多由地方主持，官方無意就醫學知識和實踐進行標準化。<sup>②</sup> 到了 20 世紀初，以西醫方式診治和西方醫院管理模式營運醫療場所逐漸被視作中國走向現代的象徵之一，衛生亦成為展現國家進步的重要元素。在 1929 年 2 月舉行之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上則有代表有意徹底改造中醫。當時 17 位與會代表均為西醫師，<sup>③</sup> 其中余巖在會上提出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力主廢除中醫。

余巖指出：“今舊醫所用者，陰陽五行六氣，臟腑經脈，皆憑空結撰，全非事實，宜廢止一也。其臨證獨持橈動脈，妄分一部份之血管為寸關尺三部，令支配臟腑，穿鑿附會，自欺欺人。其源出於緯候之學，與天文分野，同一無稽，此宜廢止二也。”<sup>④</sup> 他又提到：“（舊醫）根本不明，診斷無法，舉凡調查死因，勘定病類，預防疫癘，無一能勝其任。”<sup>⑤</sup> 他又把新舊醫、中西醫放在一個對立面，他續稱：“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為民族進化計，為民生改善計，不可不取斷然手段。”<sup>⑥</sup> 在余巖眼中，整個中醫制度缺乏衛生行政的設計，需通過政策干預，“把中醫的個體化游動形式通過‘衛生行政’

<sup>①</sup> 〈樂助施棺木抬工善會芳名碑〉，林發欽、王熹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區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 年，頁 23。

<sup>②</sup> Leung, Angela Ki-che. “Glocalizing Medicine in the Canton-Hong Kong-Macau Region in Late Qing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54, no.4, 2020, p. 1348.

<sup>③</sup> 雷祥麟：〈常山：一個“新”抗癩藥的誕生〉，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332。

<sup>④</sup> 〈中央衛生會議議案原文選錄〉，《廣東醫藥月報》（廣州），第 1 卷第 3 期（1929），頁 18。

<sup>⑤</sup> 〈中央衛生會議議案原文選錄〉，《廣東醫藥月報》（廣州），第 1 卷第 3 期（1929），頁 18。

<sup>⑥</sup> 〈中央衛生會議議案原文選錄〉，《廣東醫藥月報》（廣州），第 1 卷第 3 期（1929），頁 19。



整合進現代醫療系統。”<sup>①</sup>故此，他主張對中醫進行登記，並重新發放執照。“設立醫事衛生訓練處，使中醫接受補充教育；舊醫登記法限至民國十九年底止；舊醫補充教育限五年為止，其後不再訓練；舊醫滿五十歲以上，且在國內營業至二十年以上者，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可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此特種營業執照以十五年為限，期滿不適用”。<sup>②</sup>此外，他還提出禁止宣傳中醫，禁止中醫學校等建議。<sup>③</sup>

上述建議引起全國中醫中藥從業者的極大憤慨，各地中醫紛紛請願抗議，爭取中醫可與西醫有平等的地位。<sup>④</sup>在廣州，方便醫院主席陳惠普立即通電南洋星架坡、巴達維亞、安南堤岸、仰光、小呂宋等地中華總商會各華僑，請求力爭挽救中醫中藥。<sup>⑤</sup>在澳門，“因衛生會議，有廢除中醫之動機，各地中醫紛起反對。澳門醫生亦乘時聯絡，以謀更大之團結。以故，同善堂、鏡湖醫院及對海灣仔廣善醫院三大團體之中醫生，組織研究會，聯絡同業，商訂會章，總期在最短時間成立；並派員到省，共謀對付此次之醫潮”。<sup>⑥</sup>在3月下旬，廣州中醫藥界代表在方便醫院舉行聯席會議，成立廣東中醫藥聯合會籌備會，以維護業界的權益。<sup>⑦</sup>

1929年3月17日各地代表在上海召開大會，成立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並選派五名代表於3月21日去南京請願，向政府提出撤銷廢舊醫案、承諾推廣國醫國藥、把中醫學校納入國家教育體系、在中央衛生委員會預留席位予中醫藥從業者等訴求。<sup>⑧</sup>國民政府時任行政院長譚延闓於3月22日會見了代表團，<sup>⑨</sup>3月24日時任衛生部長薛篤弼明確回覆不會容許廢舊醫提案實行，並邀請國醫代表謝觀與陳存仁擔任衛生部顧問。<sup>⑩</sup>在3月底，此次醫潮得以結束。

然而，此後在現代化大潮的影響下，多次醫務改革和社會革新都衝擊到中醫。3月

①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54—255。

② 〈中央衛生會議議案原文選錄〉，《廣東醫藥月報》（廣州），第1卷第3期（1929），頁18—20。

③ 〈中央衛生會議議案原文選錄〉，《廣東醫藥月報》（廣州），第1卷第3期（1929），頁18—20。

④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57。

⑤ 〈方便醫院之通電〉，《廣東醫藥月報》（廣州），第1卷第3期（1929），頁28。

⑥ 〈澳門〉，《廣東醫藥月報》（廣州），第1卷第3期（1929），頁34。

⑦ 〈廣州中醫藥界聯席會情形〉，《廣東醫藥月報》（廣州），第1卷第3期（1929），頁29—30；曹磊：《杏林芳菲——廣東中醫藥》，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46。

⑧ Lei, Sean Hsiang-lin.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p. 108-113.

⑨ Lei, Sean Hsiang-lin.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112.

⑩ Lei, Sean Hsiang-lin.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p. 112-113; (美)艾媿捷(T. J. Hinrichs)、琳達·巴恩斯(Linda L. Barnes)著，朱慧穎譯：《中國醫藥與治療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239—240。

的醫潮方才平息，1929年夏，國民政府教育當局又要求中醫學校更名為“傳習所”，<sup>①</sup>不列入政府核准之學制系統。<sup>②</sup>1929年12月因中醫沒有消毒、手術、屍檢等診療手段，當局又提議中醫院不得再稱為“醫院”，更名為“醫室”，並要求中醫更科學化。<sup>③</sup>在1930年代的廣州，政府視重整與民政和宗教相關的社會組織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任務。當時政府認為傳統善堂善會為不科學、缺乏現代管理手段的機構，其醫師均未受科學評估。<sup>④</sup>當時廣州社會局更有意禁止各善堂用中醫診症及不得用中藥治病。<sup>⑤</sup>方便醫院除被要求改善院內環境外，還要求它接受廣州市社會局指導監督，並改用新式簿記方式，按月向上級呈報。<sup>⑥</sup>

同善堂位處澳門，未直接受到上述改革的衝擊。即使在中醫風雨飄搖之時，同善堂依然堅持以中醫贈醫施藥。1932年同善堂主席李際唐致函新會縣國醫館，請該館代為延請擅長治療溫病的醫師。原文如下：“本堂在澳門開辦四十餘年，現正竭力擴充以期善與人同，現擬加聘中醫一名常川駐堂診症，以利僑民。惟月薪毫銀四十元，供膳宿所，駐堂時間每日由上午七時起至十二時止，下午則任其自由出診，查到堂診脈者俱是中下流社會居多，患溫病及時行病者居其八九，是以聘任醫生以能擅溫病者為最合，素仰貴館人才濟濟，用特函達貴館，敢請代為介紹，如不嫌菲薄願就此職者，請即函示，俾得接洽為幸。”<sup>⑦</sup>新會縣國醫館正館長黃焯南、<sup>⑧</sup>副館長李銑如回覆：“本館為慎重起見，經登報定於本月十二日在本館考驗，俟取錄之後再行函達。”<sup>⑨</sup>可見新會國醫館對推薦國醫師予同善堂一事的關注，也可知在珠三角各大善堂醫館之間的互相支持。

辛巳年（1941）秋，同善堂倡建藥局，專營藥材生意。為了建立藥局，在己卯年（1939）至壬午年（1942）期間，高可寧家族捐銀19,031.5元，傅德蔭家族捐銀15,800元，澳督戴思樂（Gabriel Maurício Teixeira）捐西紙3,000元。蔡文軒、徐佩之、譚植楠、崔諾枝、馮養、黃景初、陸電明、陳作卿、姚伯泉、黃渭林、陳伯墉、黃仲良、司徒龍、

<sup>①</sup> Lei, Sean Hsiang-lin,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115.

<sup>②</sup> 〈全國醫藥總聯合會致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函〉，《廣東醫藥月報》（廣州），第1卷第5期（1929），頁20。

<sup>③</sup> Leung, Angela Ki-che. “Charity, Medicine, and Religion: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Canton (ca. 1870-1937).”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2015)*, Vol. 2, edited by Jan Kiely, Vincent Goossaert, John Lagerwey, Brill, 2015, p. 594.

<sup>④</sup> Leung, Angela Ki-che. “Charity, Medicine, and Religion: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Canton (ca. 1870-1937).”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2015)*, Vol. 2, edited by Jan Kiely, Vincent Goossaert, John Lagerwey, Brill, 2015, pp. 587-596；梁其姿：《變中謀穩：明清至近代的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228—233。

<sup>⑤</sup> 劉願可：〈本會徵求南洋各醫藥團體對於廣州社會局取締各善堂等用中醫中藥抗議之公函〉，《醫藥月刊》（新加坡），第4期（1930），頁20—21。

<sup>⑥</sup> 〈改善城西方便醫院辦法〉，《市政公報（廣州）》，第350期（1930），頁35—36。

<sup>⑦</sup> 〈澳門同善堂來函〉，《新會國醫月刊》（新會），第1期（1932），頁25—26。

<sup>⑧</sup> 黃焯南，畢業自廣州醫學衛生社，20世紀30年代位列廣州名中醫之首。見曹磊：《杏林芳菲——廣東中醫藥》，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59。

<sup>⑨</sup> 〈函澳門同善堂定期代考醫生〉，《新會國醫月刊》（新會），1932年，第1期（1932），頁25。

陸直興、李如楷、尹月洲、黃家駒、李漢培、黃雨梧、李寶書、陳鍾琳、李寶林、區應新、周錦泉等人士，英華寶號、周連記、梁永馨寶號、區照記、周大福，以及當舖行、銀業行等商號和行業在向藥局捐款之餘亦協助藥局募款。崔六、冼碧珊、鄭雨芬、徐偉卿、葉子如、盧煊仲、黃豫樵、梁後源、鍾子光、梁彥明、鄭芷湘、謝再生等澳門聞人均捐銀支持。<sup>①</sup> 高可寧更親自擔任藥局 1941 年至 1943 年的總監督，“所得溢利統歸同善堂，如有虧缺由鄙人（高）負責填還”。<sup>②</sup> 事實上，受日本侵華戰事影響，各種藥材運輸和補充並不容易，經營中藥局也十分困難。連香港東華醫院也因西醫擴張、政府施壓、財政危機和中藥短缺等多種因素，在 1945 年 7 月決定全面採用西醫，終止了中醫診治服務。<sup>③</sup> 但無論外界對中醫的看法如何改變，所謂“中醫消，西醫長”之聲如何高漲，經營中醫診所和中藥局如何艱困，同善堂依舊堅持提供中醫治療，維持了華人綜合慈善組織以中醫診治及施藥的傳統。

## 六、小結

“廣州城、香港地、澳門街”，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不同領域緊密相連，細水長流。上述的幾個事例多為日常小事，三地善堂善人互相支援各自的發展、編撰善書、捐款施棺殮葬、維護和傳承中醫藥等，我們可從中見微知著，瞭解“省港澳”慈善團體之間、百姓與善堂的互動和合作。故事的主角有大人物，更多的是小人物，這些在珠三角流動的華商、工人、善長和醫師等構建了同善堂的歷史。以紳商主導的清末民初的善堂，一方面超越血緣、地緣、業緣的限制，擴大了服務的對象和範圍。另一方面，一些外來和新生的商人，通過參與慈善救濟，提升受眾的福祉，並“以承擔重大責任來確定他們高貴地位的合法性”，<sup>④</sup> 從而建立其地方人脈和影響力。再者，當時內地地方善會向來配合各地政府的需要，不少更是以官督民辦的形式開展工作。即使在澳門，華人善堂也多與政府政策協作，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成為穩定地方和社區的重要因素。

澳葡政府在 1849 年逐步取得澳門管治權後延續了以往華洋分治的特點，並沒有過多地介入華人生活，以“無為而治”作為治理的手段。19 世紀下半葉大量移民來澳，加劇了社會對不同社會支援和服務的需要，廣大澳門紳商賢達則在學習西方慈善組織的形式並融合傳統中國善會特點的基礎上，團結各界力量以發展澳門華人社會的互助組織，填補公共產品的缺位。就民間層面而言，善堂的服務幫忙民眾渡過了艱困時期，使外來

<sup>①</sup> 《澳門同善堂藥局徵信錄（癸未年）》，澳門：同善堂，1944 年。

<sup>②</sup> 《澳門同善堂藥局徵信錄（癸未年）》，澳門：同善堂，1944 年，頁 1。

<sup>③</sup> 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 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10、233。

<sup>④</sup> 包筠雅（Cynthia Brokaw）著，杜正貞、張林譯：《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99。

移民有條件在澳扎根。在澳門這個微小的熟人社會中，善堂和民眾在“施與受”之間形成了彼此的信任並強化社會凝聚力，而各安其份、和諧共融、同舟共濟等精神也成了澳門文化的主流。就政府層面而言，善堂的善舉有利於穩定澳門社會局面，可彌補政府對華人公共服務投入的不足。澳葡當局也可通過吸納重要華人社團代表進入體制內，以相對較低的行政成本實行間接管治，既能減少和華人居民的直接衝突，又能依靠華人社團的社會認受性有效管理澳門。民間和官方的雙層認可，使綜合性的華人善堂成為穩定澳門社會的重要力量之一。上述的同善堂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紳商在清末民初時期通過施善來造福桑梓，樹立大家所認同的體制和價值觀，從而重建社會秩序的嘗試。而澳門的特殊歷史環境使本澳華人綜合慈善組織受現代化大潮的衝擊較廣州、香港善團為少，得以在走向現代的過程中保留更多的傳統特色。

（鳴謝：本文中所提及之《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澳門同善堂藥局徵信錄（癸未年）》及《聖學階梯》係多年前由羅景新先生及麥林先生借出之藏書，在此再次感謝兩位民間收藏者借出珍藏供學術研究。）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 校對 陳嘉欣 黃耀岷 ]